

重訪革命

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

1921
-
1949

REVISIT
THE
REVOLUTION

李金鐸 著

自序

革命的涵義、類型極其廣泛，而以猛烈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最為引人矚目。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中國以及其他不少國家都曾爆發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不研究革命，就無法理解中國和世界，也無法理解歷史和現實。現代意義的中國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中共革命，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的桂冠，終結了中國近代史，為新中國成立和現代化建設開闢了新的道路。中共革命以其無可替代的鮮明特色、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受到中國乃至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與悠久的傳統史學相比，革命史觀曾給中國史學帶來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新的活力，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也不能不說，在運用這一史觀的過程中，存在着簡單化、教條化、單一化的現象，中國歷史包括中共革命史的描述和解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偏差。原本為了維護革命史的正面價值、維護革命史的合法性，卻由於誇大或縮小而變得沒那麼客觀可信，從而在實際上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所謂好心辦壞事，直到今天仍是不少人沒弄明白的道理。

我主要研究中國近代鄉村社會經濟史，20世紀90年代初介入中共革命史領域。前十年，我關注到一些新的課題，也發表了多篇文章，但總覺得面孔生硬，解釋力不夠。經過痛苦的學術史反思，才發現問題的根源主要是習慣思維導致的，不革新就沒有前進的可能。我明確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研究思路，我堅信一切歷史只有讓人相信才有強大的生命力，而讓人相信的前提則是盡可能地還原歷史過程，呈現歷史的複雜

性，並給予合乎歷史的解釋。

「新革命史」中的「新」和「革命史」，分別來看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將兩者結合起來並不容易。「新革命史」的核心是：強調回歸實事求是的史學軌道，提倡以常識、常情、常理和新的理念和方法來研究革命史，將革命史對象化、歷史化、學術化。這一理念在其他領域也許並不新鮮，但將它們運用於革命史研究，相信一定會帶來新的面貌。其實，即便在其他領域，也未見得都運用和解決了吧。

本書收錄的 15 篇文章，都是 2006 年以後發表的，大都體現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根據出版社的圖書規範，對文章的註釋做了重新整理，個別錯漏之處也做了校正。這些文章既有宏觀的思考，也有具體的研究實踐，期冀對於中共革命史的認識有所深化。以上成果發表後，在學界同行中引起不同程度的反響，既有讚揚，也有質疑。令我欣慰的是，「新革命史」的提出及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革命史研究。不過，近幾年我也有新的憂慮，有的論著的確比以前學術化、精細化了，但結論卻仍是先入為主的宏大意識，缺乏辯證的反思力量。

一切論文的完成，都是由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個人的努力當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沒有老師和同行的鼓勵，尤其是沒有編輯、匿名審稿專家的辛勤勞動，都是難以實現的。本書的出版，開明書店王春永經理付出了許多勞動。對以上各位的貢獻，一併致以衷心的謝忱！

目 錄

自序	iii
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	1
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	23
「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	43
從「問題」到難題的思維轉變：「中共革命勝利來之不易」一解	67
抗日根據地的「關係」史研究	73
農民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	81
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 1937–1949 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	115
「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之關係考（1946–1949）	145
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中共民間借貸政策新解	187
衝突與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區的抗旱救災與祈雨事件	217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農村經濟的主張	239
論抗戰時期張聞天主持的晉陝農村調查	255
堅持：抗戰時期冀中區堡壘戶的形成、使命與困境	281
讀者與報紙、黨政軍的聯動：《晉察冀日報》的閱讀史	323
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	363

向「新革命史」轉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



近代中國，是一個風起雲湧、潮起潮落的「革命中國」；百年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風、可歌可泣的「中國革命史」。近代史上的中國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已過去多年，可謂漸行漸遠，淡出了一些人的視線，甚至有人指出：20世紀中國史研究已有「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的傾向。」¹事實的確如此，從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除了輿論宣傳以外，在學界都發生了由熱變冷的趨勢。究其原因，筆者以為，一是長期以來革命範式嚴重地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學術性，結果物極必反，一些學者對此領域表現出不耐煩乃至厭惡的情緒；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經濟建設佔居主導地位，這一社會現實自然也會影響學者的研究取向。除了以上兩點，還可能與前些年有人提出的「告別革命論」有關，或者說這一提法加劇了革命史弱化的傾向。「告別革命論」的核心觀點是：歷史上中國革命包括中共革命雖然有其產生和存在的理由和作用，但並非歷史的必然，歷史的發展道路還有其他可能性；革命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災難，是錯誤的，改良和建設才是中國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好途徑。²在筆者看來，從理論上分析，改良與建設比暴力革命的成本要小，所以在今後中國乃至人類社

會的發展進程中，的確應當注意和避免暴力革命，至少不可輕言革命。但「告別革命論」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當社會矛盾逼迫到一定程度，暴力革命非爆發不可之時，是否仍然說它是不合理的或者是錯誤的？二是中國革命是否就不是歷史的必然，必須經過深入的研究才可以下結論，而這點顯然「告別革命論」者沒有做到。三是「告別革命論」者特別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壞」，而對其產生和存在的理由、作用僅是蜻蜓點水，沒有任何深入的研究。以上三個問題，難免給人造成價值判斷大於實際判斷的印象。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有些人沒有認真閱讀乃至沒有讀過《告別革命》，就人云亦云，或者不着邊際地瞎批一通，或者附和「革命破壞」論，進而情緒化地厭惡乃至反對革命史研究，這也許是「告別革命論」帶來的更大問題。其實，「告別革命論」尤其是附和者忽視或違背了歷史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即：革命不全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不是革命該不該發生，而是革命已然發生，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場革命的問題。換句話說，革命為什麼發生，革什麼，用什麼革，怎樣進行，如何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這才是歷史研究的應有之義。也就是說，你可以提出「告別革命論」，但無法也不可能告別革命史研究。

站在21世紀的偉大時代，筆者認為不僅不能削弱中國革命史研究，而且應該重提革命史，並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這裏，筆者只是就中共革命史談談自己的一點想法：為什麼要研究中共革命史，傳統革命史研究有何問題，應該從何處突破？諸此都應給出較之以往更有信服力的理由和解決方案。

一、中共革命史研究必要性之多元思考

以往學者似乎都這樣認為，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為了說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論證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確性。這一認識，當然有其充分的理據，其理論意義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問題是如果僅限於此，就有些老調重談，並多少降低了中共革命研究的重大價值。筆者認為在

¹（美）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01-204頁。

²參見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一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五版。

此基礎上還應該從其他角度進一步挖掘其學術意義，以下三點或可作一補充。

第一，中共革命是近代中國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關鍵問題，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學術價值。

歷史發展的進程蘊含了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相應地歷史學者的研究內容也就包羅萬象、豐富多彩。也就是說，凡是過去發生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儘管如此，它並不意味着所有歷史現象具有同樣的研究價值，而是有的可能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那麼，如何判斷歷史研究對象價值之高下呢？其中關聯的因素相當複雜，更可能是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應該首先考量的，這就是孟子說過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也就是說，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觀察歷史的重大轉變，看研究對象是否為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核心問題，看它是否影響或決定着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走向和歷史命運。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價值極高的問題，從而最值得歷史學者的關注和探討。道理很簡單，關鍵問題搞不清楚，其他一切則無從談起。

也正因為此，歷史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不斷思考哪些才是最有價值的領域和問題。按照上述標準衡量，這樣的領域應該很多，也許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能夠說明，即中國通史類教科書所展示的多是此類問題。在這裏面，中共革命就是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領域和問題。在近代中國百餘年的歷史風雲中，中共革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影響乃至決定中國歷史走向和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與核心問題。不僅如此，透過中共革命，還可以窺見中華民族的特性，包括苦難、矛盾、傳統和變化。對於這樣一個領域進行研究，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近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演變。相反，如果忽略這樣一個重大領域，中國近代史的最終結局將很難解釋。

問題是，當今中國史學界似有忽略重大歷史課題而趨於枝微末節的

「碎化」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成果不斷湧現，似乎已有從歷史學邊緣走向中心之勢。這一大喜形勢頗使社會史學者驕傲、自豪乃至自滿、自大。在筆者看來，社會史研究的蓬勃景象固然可賀，但如不居安思危，所謂中心可能很快淪為邊緣。近幾年史學研究「碎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它主要指的就是社會史研究，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風土民情無所不包，有的甚至一味逐新獵奇，完全失去了歷史研究的嚴肅態度。這一傾向，在年輕一代學者身上表現得尤其嚴重，似乎鄙視主流，追求邊緣成為一種時尚。倘此趨勢繼續蔓延和擴張，人們對中國社會長期趨勢和重大問題的了解將愈益模糊，深陷一堆亂麻而不能自拔。

其實，社會史作為一種視角和方法，本不應限於以上所謂下層「社會現象與社會關係」，而是可以研究幾乎任何重大的歷史現象，譬如以往被視為上層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都可以從社會史視角進行研究。按此理解，中共革命也並不是一個傳統中共黨史、革命史才可研究的範疇，而是可以將革命與社會結合起來、用社會史方法進行考察，從而避免大而嘩之大而化之和深陷末節的兩極弊端。

第二，中共革命在全球民族革命史中有着重要的歷史地位，具有可資比較的典範和借鑒意義。

以上主要是從中共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所做的闡述。實際上，其意義還不完全限於中國歷史，中共革命還是世界民族革命的典範。20世紀是一個風雲激蕩的革命世紀，「震撼全球的絕大多數革命運動發生於因國際因素而起變化的落後的農民社會。」¹在這個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正處於革命歷史的舞台之上，亦即屬於這個全球落後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革命進程中，以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民眾取得全國政權這一歷史性事件最為絢麗奪目。在上述宏闊的歷史背景下，

¹ (美)撒克斯頓：《1931—1945年冀魯豫邊區的民眾起義和共產黨政權》，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頁。

中共革命就不應僅僅理解為在中國發生的一場革命，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員，它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正如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和塞爾登所說，中共抗日戰爭「這段歷史，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是重要的，對一切試圖了解以『中國革命』而聞名的這一重要運動的人，對一切試圖理解出人意料地發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工業化農業社會的這場本世紀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人，都是極其重要的。」¹

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革命相比較，中共革命的確有自己的特點。比如革命的背景與結果之間的關係，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勞苦大眾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也都有共產黨組織，但革命獲得成功的卻很少。在幾乎相同的背景下，中共革命卻獲得了勝利，由此可見有其特別之處。²又如戰爭與革命的關係，戰爭曾成為俄國、法國等地革命的酵母或為革命創造條件，但是在一場持久的戰爭中被中共動員起來的鄉下人和游擊隊與強大的日本（陸軍、海軍和空）軍作戰，不能不說是中共革命的金字招牌。³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戰爭期間，一般說來，居於統治地位的政黨十分便於從戰時民族主義中獲益，二戰中的美國、英國和德國等都是如此。但在中國卻出現了另外一種情形，抗戰爆發後，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戰時無政府狀態」中，得益者不是處於統治地位、受國際承認的國民黨而是處於敵後游擊區的共產黨。也就是說，從外國侵略和被侵略國家民族主義興起這個角度無法解釋抗戰時期中共革命的發展，共產黨之所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普遍擁護，主要不是日本侵略導致的農民民族主義的加強，而是中共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民的社會經濟

政策。¹再如革命的武裝組織，中國以農村為基礎的武裝組織所取得的經驗，與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越南、阿爾及利亞、古巴、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安哥拉、柬埔寨、薩爾瓦多、秘魯等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處。²諸此種種，都顯示了中共革命的顯著特點。

由此，筆者認為，應立足全球視野，進行各地區革命史的比較研究，充分挖掘中共革命的獨特性和世界價值。就此意義而論，研究中共革命可以為人類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體實證和理論貢獻。

第三，中共革命史對新中國的發展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這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又一層意義。

中共革命與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後革命時代尤其是集體化時期具有十分密切的承繼關係，中國許多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均淵源於此，至今仍有諸多方面呈現出革命遺產的特徵。日本學者顧琳就認為，「根據地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萌芽』」。³英國學者艾麗絲做了進一步解釋：對於共產黨建國的研究通常將其起點定於1949年，大規模的戰爭結束，國家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故這一年往往被視為「舊」與「新」的分水嶺，或「解放」。就強調國家統一、體制化、經濟和社會復生的主題的討論及研究來說，1949年作為起點不是完全錯誤的。但如果忽略或是低估了北方根據地在戰爭中對於建國的努力，則可能過於簡化了歷史的真實過程。「建國」與「戰爭」實不應被視為兩個不相容的過程，二者間的關係應是相輔相成的。我們應將共產黨的建國，視為一個包含了抗戰中各個根據地的特殊經驗，以及土地改革、內戰，獲取國家政權以及中華

①（美）弗里德曼、塞爾登：《抗日戰爭最廣闊的基礎——華北根據地動員民眾支援抗日的成功經驗》，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

②（美）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陝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35-536頁。

③（美）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麼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係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07頁。

①（美）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陝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536頁；（美）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麼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係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10-611頁。

②（美）弗里德曼、塞爾登：《抗日戰爭最廣闊的基礎——華北根據地動員民眾支援抗日的成功經驗》，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87頁。

③《張靜如、范力沛、顧琳三教授對本屆學術討論會的評議》，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57頁。

人民共和國早期各經驗之總成。¹ 中國學者陳德軍也認為，大約半個世紀前，革命的紅塵在中國基本落定。然而，革命從中源起、行進並且得以獲取最後成功的深厚的社會歷史基礎，在隨後的年月裏，依然以各種變化的，或者未曾變化的形式塑造和限制着新中國成千上百萬男男女女的行動和命運。在這個過程中，它愈益清晰地向人們表現出自己的一些頑強的結構性特徵。² 以上幾位學者的意見，都表明了這樣一個觀念：在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不能忽視「革命傳統」的重要價值，研究中共革命能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

由此筆者還想表達的是，所謂傳統不能僅僅限於當今熱鬧非常的傳統文化——「國學」，它還應包括歷史發展長河中逐漸累積而成的其他方面，中共革命的遺產就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因而具有「傳統」的意義。對這一革命傳統的挖掘，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軌跡。

二、中共革命史的傳統書寫模式與問題

儘管中共革命史在當今學術界尤其是學院派學者那裏受到一些冷落，但並非意味着它完全處於停滯狀態。事實上，由於中共革命的巨大歷史魅力，也由於當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影響，中共黨史學者對這一領域的論著還是相當之多。不過，這些論著似乎更多集中於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主要在於呈現其政治意義。筆者不否認這種研究方法的價值，因為歷史變遷的表現形式，往往就是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筆者也不否認已有學者對中共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做了全新的挖掘。

但這並不意味着筆者完全認同中共革命研究的現狀，畢竟歷史不僅

僅是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它還有更豐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內容。其實，即便是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如果不與當時的社會聯繫起來進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實際的認識。這裏筆者最關心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或者說中共革命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回顧以往的相關成果，恐怕不僅僅是數量少的問題，而是在研究思維與方法上存在着不可忽視的缺陷，現在需要對之進行深入的反思。

大致能夠反映中共革命社會變遷的論著，主要是根據地、解放區的研究。以中共華北革命根據地、解放區而言，成果不可謂不多，論文已達數百篇，著作數十部，最具代表性者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魏宏運《華北抗日根據地史》、謝忠厚《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張國祥《晉綏革命根據地史》、齊武《晉冀魯豫邊區史》等。必須指出，上述論著全面論述了根據地、解放區的發展演變，有力地推動了中共革命歷史的研究進程，具有極大的開創性意義。

但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又過去 20 年，迄今大多成果並未超出甚至低於上述論著的水平。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思維陳舊的簡單化傾向，即沿襲着革命歷史書寫的傳統革命範式，更準確地說是黨派史觀的範式。譬如中共革命為什麼取得最終勝利，以往成果尤其是大陸學者的「分析術語和思維方式都和當時的歷史文獻十分接近」，¹ 也就是和當時的革命宣傳相類似。

也正由於此，往往將中共革命的勝利從歷史必然性角度作線性解釋，亦即「好像普遍認為革命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認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是歷史潮流。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前景的預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都指出革命勝利的必然性。因而，革命為什麼成功是早已解決了的問題，有待解決的問題只是共產黨如何制定正確的方略和路線以贏得這一勝利。結果，黨史研究主要研究黨內路線鬥爭，證明的無非

¹ 艾麗絲：《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馮崇義等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6 頁。

² 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頁。

¹ (美)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陝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 538 頁。

是毛的正確路線如何導致勝利，而錯誤路線如何導致失敗。」¹

在此思維指導之下，問題最為嚴重的就是單一的「政策——效果」模式。譬如，在中共革命與農民關係的關係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權的政策演變、農民接受並獲得了利益以及革命鬥爭、革命建設積極性提高的三步曲。換句話說，因為中共政權力量的強大，大多學者可能會有這樣不言而喻的認識，共產黨與民眾、共產黨與基層社會，就是單向的「揮手」和「跟隨」、「控制」和「被控制」的關係，共產黨正確的領導方針與農民革命認同之間是一種必然的邏輯關係，民眾的一切行為都是理所應當的。民眾行為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表明中共政權的巨大權威和力量。²

顯然，這種認識將中共革命神話化了，進而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複雜性。因為它忽略了農民參加革命的主體性，忽略了傳統社會與革命政策的關係，忽略了農民的猶豫和掙扎³，忽略了共產黨遇到的困難、障礙和教訓。總之，將一道革命難題變得不費吹灰之力。筆者認為，這種表面上「高大全」式的稱頌實際則貶低了共產黨的偉大，「因為黑白評價，全白的任務和全白的政黨好像跟超人一樣萬能。那麼超人所作的事情不管有多麼偉大，哪怕是奇跡，我個人很難感覺到什麼佩服和尊敬，對超人來說，創造奇跡是很平凡的易如反掌的事。這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反過來說，要是把領導中國革命的人物和政黨看成跟一般血肉之軀的人一樣，他們所作的事才真的值得佩服尊敬。只要能夠承認他們的缺點、短處、錯誤與失敗才能夠欽佩他們的天才、長處、智慧與成就。」⁴

①（美）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陝北早期革命史》，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 537 頁。

② 參見本書《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 1937—1949 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

③ 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 ——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頁。

④ 《張靜如、范力沛、顧琳三教授對本屆學術討論會的評議》，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 656 頁。

為了對傳統革命史學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解剖，筆者以中共民間借貸政策的演變為例，稍作比較詳細的闡述。

在中共根據地、解放區鄉村，中共政權以從未有過的外在強勢，推行革命性的土地政策，或廢債或減息，使得原來盛行的傳統借貸尤其是高利貸受到空前的衝擊、削弱乃至消失殆盡。也正因為此，以往的學者都有一種既定的認識：中共的革命性政策是以一貫之的，抗戰時期始終是實行減息 1 分或 1.5 分，解放戰爭時期一直是廢除債務政策。也就是說，對傳統借貸從未妥協、調和，而是順風順水，所向披靡，由此跳出和避免了歷代王朝所遇到的困境，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民的借貸難題，從而受到農民的極大歡迎。這恰恰就是典型的傳統革命史書寫模式。

事實究竟如何呢？革命政策與民間傳統的關係遠非人們想像的那樣簡單。以 1937—1949 年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為例，民間借貸政策先後經歷了三個階段：

1937 年抗戰開始到 1941 年底為第一階段，借貸政策的主題是不論新債舊欠，一律減息。各個根據地的利率限定，大體都在 1—1.5 分之間。這就意味着，不管放貸者是誰，只要超過 1—1.5 分，即與高利貸沒什麼區別，不會受到法律的承認和保護。在此階段，減息政策已經實施的地區，傳統借貸尤其是高利貸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農民債務負擔明顯減輕，似乎中共已經斬斷了農民與傳統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臍帶，甚者說萬事大吉了，這也正是以往學者所着力渲染的一點。其實這僅是問題的一面，而另一面卻是：農民曾經對減息之後借不到債的擔心竟變成了事實，地主高利貸者不再借給農民錢的威脅也變成了事實，農民借貸停滯已成為農家經濟生活繼續運行的障礙。減息本來是為了緩解農民債務負擔，為其創造一個有利的金融環境，但減息之後令人沮喪的借貸停滯的現象，引起了中共中央及根據地領導的注意。如何解決減息政策所帶來的借貸困難呢？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政府、銀行向農民發放貸款，但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財力拮据，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政府又發起民間「互借」運動，鼓勵有餘糧餘錢的人借出來，但也沒有顯著

的改善。況且這種行政命令式的干預，常常釀致強迫借貸之事，反使得富戶不敢出借。可以說，這兩種方式都未曾有效地解決農民金融問題。也正因為此，政府對借貸利率過低的減息政策提出疑問，並重新審視傳統借貸對農民經濟和生活的價值，形成兩點共識：一是農民在減租減息後必須交租交息，二是利率限制不應低於社會經濟基礎所允許的程度。¹也就是說，革命政策的實行並不是那麼一片坦途，民間借貸秩序的死滯促使中共政權對鄉村經濟運行規律進行了解，認識到革命無法斬斷傳統制度的價值，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基礎無法逾越，於是對傳統借貸開始產生了尊重、妥協和利用的傾向。但正是這一問題，為以往學者不曾注意，或者說不願意面對和承認的。

1942年初至1946年「五四指示」頒佈前，為華北根據地、解放區民間借貸政策演變的第二階段。其主題是對舊債繼續實行減息，而新債利率則自由議定，革命政策與傳統借貸達成一定的調和，借貸政策開始具有革命、妥協與調和的多面性。以往對此階段減息政策的研究，只注意如何開展和擴大減息的一面，對新債利率自由議定的政策卻視而不見。具體情況是：經過對第一階段減租減息政策的思考，中央對土地政策進行總結並於1942年1月、2月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這一文件標誌着抗戰時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也為根據地的借貸關係提供了指南。²一方面對舊債繼續實行減息，仍以1.5分為標準，但與以前新債舊債一律減息不同，強調減息是抗戰前成立的債務，不是減今後的；二是新債利率自由議定，與以往有關條例相比，這一規定是最大的變化。

¹ 劉少奇：《關於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政策問題》（1938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頁；《中央關於華中各項政策的指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9—194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0頁；毛澤東：《論政策》（1940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頁。

² 《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及附件，1942年1月；《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1942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2—1944），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2頁。

追溯土地革命時期，中央文件更是從未有過新債利率可以自由議定的任何表示。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件中沒有一處提到禁止高利貸，個中原由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無意的疏忽。儘管如此，中共對新債利率自由又保留了一個迴旋的空間。也就是說，雖然借貸雙方可以自由議定利率，但如果債戶遇到不可抗拒的困難無力還債，仍可以提出減息，這時就等於回到了先前的減息狀態。可見，對傳統借貸不尊重、不妥協不行，完全妥協也不行，反映了革命政策與傳統制約的內在緊張、困難選擇和調和性質。

1946年「五四指示」頒佈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之前，為華北根據地、解放區民間借貸政策發展的第三階段。借貸政策的中心是廢除封建舊債，但在某些地區仍然實行減租減息；與此同時，繼續沿用新債利率自由議定的政策。在此階段，由於土地改革的大規模推進，革命政策對傳統借貸的衝擊空前激烈，已由減息提升為廢債了。儘管如此，激烈之中也有些許調和。以往對這一階段借貸關係的研究，只注意到如何開展廢債運動的一面（儘管是主要方面），對新債利率自由的一面忽略了。其實，但從文件上看，如果說1942年以後中央及各根據地對新債利率自由仍有一定的限制，而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五四指示》、1947年《土地法大綱》之後，中央及各解放區在正式文件上對新債利率沒有表示任何的限制。¹這說明，儘管土地改革和廢除封建舊債非常激烈，但在新的借貸關係中，中共對傳統借貸方式仍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這一態度取向，一是因為地主高利貸者的舊債消滅之後，新債主要是普通民眾之間的借貸關係，普通債務當然是受到鼓勵的；二是即便號召新債利率自由議定，實際上很難執行，這一結果反又成為中共強調新債利率自由的因素，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一體。

¹ 《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1948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借貸問題的指示》（1948年2月），《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259頁。

不過，新債利率自由議定的政策比抗戰時期更難實施。在砸爛舊世界的土地改革中，地主高利貸者及其剝削受到史無前例的蔑視和痛恨，它已成為幹部、群眾最覺可恥的東西。這種心態很容易走向另一極端，將反封建剝削擴大化。這種意識也反映到私人借貸關係之中，一些人甚至認為只要有利息就是剝削，私人借貸不能認利。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所謂新債利率自由議定就成了一句空話。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在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高利貸者，農民歡呼雀躍的同時，借貸困難繼續纏繞着農民，而且比過去更為凝滯。可見，在此階段，封建舊債廢除與新債的自由約定仍是一對極難解決的矛盾，對傳統借貸的妥協與調和並未取得明顯的實效。民間借貸在革命期間始終未能活躍起來，農民借不到債的痛苦一直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和平建設的今天，國家金融法令與民間借貸制度的關係仍是一道難以求解的問題。

以上所述才是中共民間借貸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歷史真相，而傳統「政策——效果」的論述模式卻大大掩蓋了中共革命鬥爭的複雜、曲折、艱難與痛苦。表面看來，真實的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恰恰是這種艱苦的努力彰顯了中共革命的光輝。

三、中共革命史研究從何處突破？

如何改進傳統革命史的書寫方式？上節所舉例證，實際上已經顯示了筆者要提出的研究取向，這裏再從兩個角度做一申論。

第一個角度是加強中共革命史與中國鄉村史的連接。

所謂二者之間的連接，也就是將中共革命納入鄉村史範疇，反之亦然。這一方法並非是人為的臆造，而是中共革命和中國鄉村社會之間的關係所決定的。

歷史已經證明，中共革命的成功與中國農村、中國農民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繫。從 1927 年中共發動武裝起義開始，毛澤東率先在井岡山地區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隨着各個根據地以及中央根據地的建立，

中共政權初具規模並形成獨特體系。而後，經過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不斷發展壯大，直至建立新中國，政權組織日益複雜和完整。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始終是中共革命的主體力量，農村一直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依托，中共革命依靠中國農村、中國農民才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說，中共革命實質上是農村革命、農民革命，中共政權與農村、農民的關係是最值得重視的核心問題。也正因為此，著名中共歷史研究專家塞爾登指出「半個世紀以來引起人們對中國革命展開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中共與農民的關係，正是這種關係決定了中國的游擊戰爭或人民戰爭的特色。」¹ 中共革命與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這一密切關係，決定了它在中國鄉村尤其是中國近現代鄉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也正因為此，才使得我們有可能也必須從鄉村史視角考察中共革命問題，也只有將中共革命納入鄉村史範疇，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論中共革命，從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與變遷。

反過來，從鄉村史而言，中國鄉村史包括中國近現代鄉村史的研究應該包括所有在鄉村發生的歷史現象。由此，它就不能僅僅限於傳統鄉村以及向近代轉型的近代鄉村，還應將中共革命納入鄉村史研究的範疇。否則，就很難說是完整的鄉村史，也不能理解中國鄉村史的發展趨向。

就以上思路而言，目前的研究顯然不能令人滿意。中共革命史與中國近現代鄉村史似乎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老死不相往來。

中共革命史學者雖然都認為農村與農民是中共革命的核心問題，但很少有人從鄉村史角度理解這一問題，結果就導致了筆者上節所舉民間借貸政策的例證中忽視傳統鄉村社會因素對革命策略的制約，以為中共革命性借貸政策以一貫之，所向披靡，從而簡化乃至迴避了中共革命政策實施的複雜和曲折。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不懂得或不熟悉中國傳統

¹ (美)馬克·塞爾登：《他們為什麼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係的反思》，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 607 頁。

鄉村歷史，不知道農民離開借貸無法運轉自己的經濟與生活。如果了解這一歷史現象，就會明白，通過政府命令的方式雖然可以削弱乃至廢除高利貸，但只能是奏效於一時，仍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借貸問題，中共對民間借貸政策的調整正是對傳統借貸需求的一種反映。

反過來，中國鄉村史學者也很少有人關注中共革命史，在他們的論著中幾乎沒有中共革命中農村問題、農民問題的位置。這種傾向同樣導致了對中國歷史認識的偏離，比如中國農村的社會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於土地分配關係和封建剝削關係，現在學界似乎越來越認為土地分配是高度分散的，租佃關係比例不大，地租剝削不嚴重，主佃關係和睦。如果說這種認識對以往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的極端化理解有一定糾偏作用，但同時也走入了另一淡化社會矛盾的極端。倘若對中共革命歷史有所認知，就會明白，果真如此，中共革命尤其是得到農民支持的一場革命將無從談起，難道革命的發生是一個偶然的意外嗎？顯然，不研究中共革命史，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就難有準確的把握。

第二個新角度是社會史研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視角。

如前所述，用社會史角度，將革命與社會結合起來，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其實，早在 1991 年著名中共黨史學者張靜如就發表過一篇論文《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¹，號召中共黨史學者參與社會史研究、豐富黨史研究的內容。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共黨史學者的關注，隨之也出現了注重從民眾視角進行研究的社會史成果。但總體來看，效果不夠顯著，中共黨史、中共革命史的複雜關係仍未真正揭示出來。

筆者以為，要想實現中共黨史或革命史的真正突破，固然應該增添和豐富為以往忽視的社會史內容，譬如中共政權下的家庭宗族、衣食住行、風土民情等，但最關鍵的恐怕還在於研究思維的轉換和研究視角的

創新。否則，即便是從社會史方向研究中共黨史或革命史，仍然會出現筆者上面所談到的弊端，或者研究陷入碎化，或者是表面上強調社會史方法，實際上仍未擺脫傳統革命史的研究範式。進而言之，這實際上不僅是中共黨史、中共革命史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史研究應該反思的問題。

在所有的的方法轉換中，最應強調的是改進上述傳統革命範式下的簡單思維模式，並將此作為今後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首要目標。簡單地說，就是在回歸實事求是基本精神的同時，應進一步尋求新的研究視角，注入新的理論與方法。在新的理論與方法中，筆者以為，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即國家政權與民間社會雙重互動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點和突破點。

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互動關係的視角已越來越成為分析人類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有效路徑，而以西方學者的成就最大。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簡單說來就是政府權力的實踐形態以及民間社會對政府權力的制約。早先的主流意識強調的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單向地施加權力，將政府與社會僅僅表現為二元對立、排斥與衝突的關係。而今理論界已改變了這一看法，普遍認為二者的關係應該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重疊的互動，研究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就是研究來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權力和來自社會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所謂互動既包括兩者間的排斥、衝突，也關聯到二者的融合與轉換，或者排斥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總之是排斥、融合乃至轉換的互動過程。

就此而論，筆者不太贊成目下中國有些社會史學者特別強調的「自下而上」的單一視角。「自下而上」儘管對傳統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種糾偏，也是社會史興起的理論基礎，但矯枉過正，甚至將「上層」邊緣化了，則是犯了傳統模式同樣的錯誤，也不可取。其實，所謂「自下而上」並不能完全取代「自上而下」，自上而下仍有其方法論價值，如果對上層政策及其對民間社會的影響不了解，很難想像可以從下而上看歷史。就此而言，比較合理的還是上下互動的研究方法。

¹ 《歷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這一視角與中共革命的歷史實際是契合的。自清末民初以後，政府力量逐漸向農村滲透，但真正比較徹底進入鄉村、控制鄉村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像共產黨那樣，對農村社會面貌進行了巨大規模的改造，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由此變得空前頻繁、密切。正是這一歷史構造，為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視角提供了用武之地。使用這一方法之後，就可以解決為傳統研究所忽視的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之間的複雜面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揭示中共革命策略與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

如前所述，傳統的單向度思維對中共革命的政策威力過於渲染甚至神化，農民的主體性消失了。實事上，中共政權與基層社會之間的關係並非人們想像的這樣簡單，而是一個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轉換的互動過程。民間社會、廣大民眾並非完全被動的角色，民間傳統運行方式、民眾傳統心態及其行為也在相當程度上制約着共產黨的政策，塑造着中共政權本身，由此可以說「我們的革命是在改造社會，但社會也在改造我們的革命」¹，甚至還可以說，這種傳統的「連續性比那些表面的明顯變化更基本」²。也正是由於民間傳統對革命策略的制約，中共革命政策、方針的貫徹實施並不像有些人所描繪的那樣一路高歌，中共革命法令與具體實踐、實際效果之間經常存在着同一性與差異性，因為「在其操作層面上，則往往難於避免層層加碼和層層過濾，發生各種變通和扭曲。正因為此，在考察鄉村社會轉型時，不僅要重視關於鄉村轉型的各種理論、學說，解決鄉村問題的相關路線、方針、政策，而且更要重視研究所有這一切如何落實於鄉村社會實際，以及鄉村社會本身如何接受、消化這些理論、學說、路線、方針和政策。」³也就是說，我們不僅看表面的政

策、法令，更應重視實際發生了什麼，並探究為什麼有時是一致的，有時是背離的。

以上觀點在中共革命進程中的證據俯拾皆是。前述中共民間借貸政策所遇到的農民借貸停滯的困境以及將政策調整為新債利率自由議定，就充分體現了傳統民間借貸習慣的強大慣性以及對中共革命政策的反作用力。再以土地改革時期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為例，中共政權的官方建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偏離存在於多個層次，階級鬥爭的主要舞台是村莊，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們中的許多人完全逃過了階級鬥爭。在村莊裏面，那些被作為地主和富農進行鬥爭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中共土地改革的劃分標準，其他根本不應該但又確實被劃為地主和富農的人，絕大多數是在土改的激進階段被當作鬥爭對象的。一些人被劃為階級敵人，並不是他們的階級身份，而是因為他們的逾越規範的行為：參加或同情國民黨，皈依外國宗教，當過漢奸，或者做過錯事、壞事；另外一些錯劃分子，僅僅因為是幹部的對頭。¹由上可見，共產黨的宏觀政策與各地的具體實踐之間是有相當距離的，農村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對中共政策進行了過濾和變通，反多來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又會產生影響。此例表明，要想對中共策略的制定和實施進行深入研究，就必須改變以往革命史研究自上而下的固化思維，從革命權力與農村社會的互動視角來考察、理解中共革命的複雜軌跡。

進一步言之，在革命策略與具體實踐的張力之間，不同層級幹部、不同階層群體和不同個體對革命策略的態度，既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也會因利益的差別而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影響着革命策略的實施。以參軍為例，此謂中共革命研究的核心問題。傳統描述多為中共政權和軍隊一號召，就出現了「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似乎是農民都有高度的革命覺悟。實際上，面對擴軍動員，農民參軍的動機是非常複雜

¹ 《陳旭麓文集》第4卷《浮生錄》427條與442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² (法)畢仰高：《抗日根據地中農民對中共動員政策的反應：一些西方的觀點》，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第650頁。

³ 姜義華：《革命與鄉村》總序，黃琨：《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第5頁。

¹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82頁。

的。在山東莒南縣，解放戰爭時期農民參軍有以下類型：「甲、快勝利了。這是一般的動機，佔大多數。乙、快『實行了』要翻身，不受壓迫，打倒大肚子。這是一般黨員和工人的動機。丙、八路軍生活好。丁、為了學習進步。這是一般青年的動機。戊、老六團武器好。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問團員的動機。己、抗戰後找個好老婆。這是沒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參軍動機。庚、家庭壓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壓迫。辛、升官。中農成分及少數英雄思想較濃厚的村幹部，都有這種動機。壬、報仇、或怕鬥爭。這是個別的。」正是根據以上具體情況，莒南縣委要求領導幹部要善於把握各種對象的參軍動機，進行具體動員。¹ 參軍如此，入黨也相類似，不再贅述。此例再次表明，只有通過政權與社會互動的視角，才能看到傳統革命史學經常忽略的東西。

令人欣喜的是，近幾年已有少數學者開始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其中，成績較為突出的是人類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代表作有：海外學者弗里德曼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黃宗智的《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何高潮的《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的分析》（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丸田孝志的《太行·太嶽根據地的追悼儀式及民俗利用》（《近きに在りて》第 49 號，2006 年）、《國旗、領袖像：中共根據地的象徵（1937—1949）》（《アジア研究》第 50 卷 3 號，2004 年）以及大陸社會學者郭於華的《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楊念群主編：《新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與「生產」》（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三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年版），張佩國：《山東「老區」土地改革與農民日常生活》

（《二十一世紀》2003 年 4 月號），黃道炫：《洗臉——1946 年至 1948 年農村土改中的幹部整改》（《歷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韓曉莉：《戰爭話語下的草根文化——論抗戰時期山西革命根據地的民間小戲》（《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以上論著都對中共革命政權與普通農民的关系進行了頗富價值的探討，其挖掘檔案資料、注重理論分析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筆者近年也開始關注這一問題，發表了《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 1937—1949 年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中共民間借貸政策新解》（《歷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等論文。儘管這些成果仍是零散的、初步的，距離全方位透視中共革命政權與農村社會的互動關係仍相差甚遠，但仍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範本。

綜上所述，中共革命史雖然是一個老問題，但它的研究遠未走到盡頭。只要繼續開拓新視野，老樹仍可以綻放新的花朵。筆者以為，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相互聯結和互動視角就具有這樣的使命和價值，它將為中共革命的歷史進程提供一個新的解釋構架，從而實現中共歷史研究的突破。也許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證明中共革命勝利來之不易！不僅如此，通過這一視角的研究還可以為建立和諧的國家與社會、為當今新農村建設提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也為國際上普遍使用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提供新的實證支撐和理論貢獻。

原刊《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¹ 《濱海區莒南縣委關於擁軍參軍工作具體總結》，莒南縣檔案館編：《無私奉獻的人們——莒南縣戰時擁軍參軍檔案資料選編》，1991 年印，第 80—81 頁，轉引自王友明：《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東莒南縣為個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3—114 頁。